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八期 ——
(二〇〇五年二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2b)

【人物追踪】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	张思之
【往事如烟】回忆罗瑞卿挨整前后	王仲方
【难忘岁月】知青历史：没有终结的终结者	《南风窗》记者·邓 贤
【各抒己见】讨论文化革命（下）	扬 帆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

• 张思之 •

—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

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二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作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历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有些道理。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磨砺，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于是撇开话茬，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李作鹏果然是破译密码的行家，端详他此时神态，

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情景。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国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时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至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

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三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怨尤，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

□ 原载《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

#### 【往事如烟】

回忆罗瑞卿挨整前后

• 王仲方 •

◇ 晴天霹雳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一九六一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一九六二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十二月六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会议，至于讨论什么问题，连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纳闷。过了两天，谢的秘书来说，这次会上秘书很轻松，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到与会者手中，不让秘书参与。什么事情这样保密？我有些疑惑。接着我看到与会者住房名单，党政军领导人都有，惟独没有罗瑞卿。我有些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十二月十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约我到 he 那里休养。我推测这封信是罗瑞卿的秘书从云南带来的，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估计罗瑞卿已到上海，一种神秘的气氛，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会议结束后，大约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次突发事件。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

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

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志，过去一听说我回来，就会赶来看望，这次一个人都不来了。熟人遇见了，也都尽量躲避。面对面无法躲避时，竟然两眼瞪着，满脸憋得通红，有话不能说。有一位熟悉的同志是无锡人，见我时笑了笑，我请她到家里吃她喜欢的面筋烧肉，她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告诉我说她不能来了。过去回家，电话不断，这次也无人来电话了。家中显得极为冷清，我也不出门，在家中陪我老父亲拉拉家常。

我父亲王肖山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一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是一位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教育家，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参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却无法向他说清楚当前发生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冻结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人和周围的联系也冻结了。太阳不再温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这艘巨轮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渐渐地沉没。

我给罗的秘书郭树元打电话，说去看他们，他连忙说你千万别来，我也不便来你家。我们只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约好在什刹海碰头。我到约定地点，见他推着自行车过来，他对别人托词说是出来治牙。郭树元同我边散步边谈话。他告诉我，罗在云南考察边防，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在飞机上罗像往常一样看文件，处理公务。下了飞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来接，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罗很诧异，问陈丕显开什么会，陈只回答说到了住处，周总理、邓小平会同你谈。果然，一进门，周、邓在楼下会客室等他，同罗谈了“上海会议”的情况。罗在突然袭击面前极度震惊，接受不了，要求面见毛主席。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还批评罗太天真了。秘书们一到住处，按惯例要接通多种电话，这次被告知，所有电话已被切断。罗的夫人郝治平由邓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楼，两人抱头大哭。“上海会议”结束，罗就随周恩来回到北京。与外界联系也切断了，只有与彭真还能通电话。罗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语，考虑怎样写检讨。郝治平也是闷声不响。郭树元是公安部研究室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如今他满脸疑惑地说：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该怎么办？翻了几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劝我还是早些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为好。我的妻子史洛明，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干部训练部副部长，历来列席公安部党组会。她告诉我最近党组开会不叫她参加了，换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出席。这位同志开会回来，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觉得气候骤变，但还是每天去上班。

春节来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怀仁堂有晚会。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同志）给史洛明两张票，让她陪我去看戏，舒舒心。当我们跨进怀仁堂大门，正巧遇见了公安部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副部长也带着孩子来看戏，见到我们，他的表情一反常态，冷若冰霜。在会场上还看到了罗瑞卿的几个孩子，我同他们招手示意。这场晚会是空军文工团排演的，表现抗美援朝的戏，当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周恩来看戏，我的座位恰好离周很近。会后第二天，洛明下班回来说，公安部那位副部长很生气，责问是谁给王仲方送票，还同周总理离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不能久呆了。正在这个时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阳出差。我明白，公安部是要赶我走了。于是我们全家团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告别了老父亲，同洛明一起上火车站，她去沈阳，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尘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凄凉地离开了北京。

（作者原为罗瑞卿秘书，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

【难忘岁月】

知青历史：没有终结的终结者

•《南风窗》记者•邓 贤•

岁月如梭，知青历史以及由其形成的文化似乎就要淡出中国的历史了。尽管世间没有永垂不朽的东西，但是10年的时间和经历不容置疑地影响了整整那一代年轻人；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衰老和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精英站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知青历史的影响，但是他们教育的孩子都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知青，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更希望洞察他们的将来——这些将与我们有关。我们访问邓贤，因为他也是知青，还是著名作家，并且一直在写关于知青的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样看待“知青文化”和“知青历史”，能不能说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

邓贤（以下简称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知青评论自己总会有局限，如果历史距离不恰当，自己评论自己都不会准确。

知青的很多问题现在我都还觉得困惑。知青历史与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它是中国“文革”历史的一个部分，谁能说“文革”是可以忽视的历史呢？2000万人上山下乡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抽掉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之一，但是准确评价它很重要，这关系到社会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我始终认为红卫兵是在忠诚的旗帜下做了最不忠诚的事情，因为出现了红卫兵，有了“文革”，才有了知青，他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殊，不可重复——它的代价是整个民族精神的狂热和崩溃。我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懂得爱惜自己，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在走向平等，这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苏醒。

《南》：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当过知青，所以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或者希望述说自己的历史，甚至辩护？

邓：的确因为我自己当过知青，有种爱屋及乌的味道，就像当了多年兵的人无法不留恋军营。

但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又不承认我一直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左右，这种痛苦的矛盾致使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评价知青。我觉得你们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会客观多了。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将来有了对知青历史认识更深刻的人可能还会写知青，而我们这些对自己知青情结不能超越和消解的人写文章很难克服，克服刻意放大的个人痛苦。

《南》：你认为知青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在被“红色风暴”席卷的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红卫兵处于怎样的位置？

邓：“文革”初期造反3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3年期间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都无法毕业，无法就业，而且那代年轻人的破坏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不让他们下乡似乎也别无选择了。把2000万青年学生投入到6亿多农民中，接受身体乃至生命的重新塑造，很快可以把一切都“淹没”掉，这是当时政治家的决策。

中国的红卫兵不是唯一的现象，在法国和日本也都出现过红卫兵。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也规定所有的青年必须经历两年劳动锻炼，但是像中国知青这样一去10年，而且是靠斗争才得以回来的情况则是中国独有的。

《南》：当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是怎样刻写进知青们的心灵深处的？

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空前激烈，不仅仅表现在知青身上，而是具有全民性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性，那时候政治话语统治着整个社会。一切服从国家，一切服从领袖是那个时代的显着特点。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另外一方面又极端愚昧地忠诚，义无反顾地去了农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和领袖来安排。

知青们当时只会唱革命歌曲，但那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可能接触和被允许唱其他歌曲，否则就会被所在的集体谴责。我觉得当时整个国家都缺少思想武器，因为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其它东西了，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精神形态却不是唯一的，所以用单一的方法很难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南》：当年知青中的一些“精英”正处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比如你本人），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探索和批判？

邓：我见过失败的知青也见过成功的知青，那个痛苦时代带给了知青们巨大的缺陷，多数人都不能克服这种缺陷，它是这一代人的致命伤。现在知青们能不能再次超越自己，我也不太乐观。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心态平静地过好下半生已经不错了。知青中的少数“精英”是在一代人付出生命和精神代价之后，以此为基础得到成功的，整整一代人对他们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可惜他们的表现总是令人遗憾。

《南》：你能否谈谈知青们当年的政治热情与现代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什么区别？

邓：政治热情是知青最典型的特征，在他们的思想文化里，参加“文革”即是关心国家的表现，

那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即便是盲目的政治热情，也觉得是在效忠社会、效忠国家，还和英雄主义、国家至上与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很难说那时的政治热情与现在的国家公民道德和义务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需要不同的公民，以及他们所呈献出来的道德和义务；反之不同的公民也将塑造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尽管我内心对知青们的政治热情持批判态度，但我不会公开去做。我只想知青的历史对后代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反思的借鉴。

《南》：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什么，它在当今主流精神里有着怎样的痕迹？

邓：现在时间还太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定会留下东西，比如不断出现的各种知青文学，它可以告诉后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对知青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现在渐渐理智和客观了，是好是坏后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多数知青仍然健在，他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他们仍然可以有着欲望和理想，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横流。

《南》：10年时间里，你先后写了《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和《中国知青终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历程？

邓：写《中国知青梦》时倾诉欲望太强了，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说。7年的知青经历，后来又见了很多，听了很多关于知青的故事，也看了很多知青的档案，总觉得不说不行了，那是一种情感被多年压抑后的总爆发，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抚慰。

1997年写《天堂之门》，主要是注意到知青们已经回城了，他们的经历太特殊，或者说伤痕太深，留给他们的缺陷致使他们在事业上的失败，而且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这本书引出了不少非议，许多知青对它不太满意。

2001年开始写《中国知青终结》，前后拖延了两年多，可以说是因为越写越迷惘，理智和情感的斗争很激烈。到境外参加缅共进行武装斗争的是知青中思想最单纯的一批人，对他们如何评价让我觉得很矛盾，尽管他们的个人品质是好的，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方向都错了，个人是无力违背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情感陷得太深了，甚至接近疯狂了。我在内心强迫自己要同情他们，理解他们，所以造成理智经常迷失，也会自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

《中国知青终结》是我写作上的一个教训，并非所有的勇敢精神和行为都值得后人去赞扬，作家不该怀着个人情感去写作。

《南》：你的书读后总觉得像一部中国青年苦难史，是不是知青文学无法超越苦难书写？

邓：苦难也是我个人的局限，我的身心也经历过7年的知青苦难，所以我无法完全摆脱，以至于在作品中还有许多局限，我也希望将来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这种苦难。优秀的知青作品应该多一些平静、宁静，而不能总是一种激动态度。

《南》：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这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这种逃避自身检查的文化，是我们的劣根性之一，知青苦难命运的发生，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这个问题可以问任何一名知青，因为这涉及到个人与历史潮流的关系，一个能够反省的民

族才是理性、成熟的民族。这一代人从学生到红卫兵，再到知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大家都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态度，犹如不能把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完全推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一样。

现在知青们早已融入各种人群，都应该从自己与社会关系冲突中得到教训。一些红卫兵曾经殴打自己的老师，虐待自己的同学，参加“破四旧”，与父母断绝关系……表现都非常残忍，令人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知青们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宣扬自己的痛苦。尽管当时是整个社会的导向出现了错误，但是个人的反省能力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品质，以及他推动这个社会的杠杆能力，不会反省的人，社会生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如果说到知青中的精英，他们更应该是能够反省，敢于批判和超越自己的，反之就是假精英。

《南》：《中国知青终结》是不是意味着知青历史和文化的终结，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你当作中国知青历史和文化的代言人和终结者？

邓：这本书本来想叫《中国知青祭》，但是出版社不同意，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以后我出个人专集时准备把名字改回来。

原来我以为知青回城已经代表知青历史的结束，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忘记了还有大批知青为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异国他乡战斗，他们是最后一批以中国知青身分在活动的人，只有他们的归来才能算作知青历史的终结。我个人的行为与知青的终结毫无关系，这也是一个误会。

我无法作为知青的代言人，我只是一名作家，而每个知青都有写作的权力，都有自己不同的记忆和判断，我只是写了自己对知青的记忆、判断和认知。

□ 原载《南风窗》

~~~~~

【各抒己见】

## 讨论文化革命（下）

• 扬帆等 •

（续上期）

李盛平：为什么右派和造反派互相不认同？从右派，到自由化互相认同，是因为民主取向。五七年右派的民主议会倾向，与专制体制不合。毛泽东最反对斯大林，但都是专制的，当然有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当时是想征求意见的，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和体制冲突的思想力量。右派在思想上是异端。文化革命是继续坚固毛泽东体制的，你再怎么造反也出不了他的手心。为什么出现非常血腥的文化革命？我们都抄过家，应该忏悔。

整个文化革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强化了体制，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农民起义，战争体制，等因素，新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利益矛盾。老百姓对于官僚的反感很大。文化革命是强化了专制体制，特别是思想控制。即使杨小凯参加的省无联也只是提出“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大家都是拥护毛泽东主义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超出体制。四五之后思想才改变了方向。邓小平，陈云等都不是简单恢复17年。邓开始有自己想法，对毛泽东体制有比较大的突破。当时我们如果不参加竞选，是不是有利于党内改革派发展？

个人忏悔对于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当时没有对的道路可走吗？大家也都有委屈。作为一个民族，如何忏悔？我当时是中学生，和余秋雨的忏悔肯定不同，他在当时得到了好处。

黎明：只有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才有忏悔的习惯。中国文人写的东西从来都是说，我从来都是正确的。25史那么多文字，统治者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的错误？忏悔是对走过道路的思考。是负责任的精神。

张祥平：中国皇帝下罪己诏的很多。说忏悔不如说是反思。德国民族的反思不仅是战争，还有他的优等民族的观念。中国也不应该仅仅反思文化革命，还有近代以来的乌托邦，从五四运动开始。

高粱：我们在今天还有人把七十年代的东西登上来，甚至是相当正面的态度，我非常吃惊并不理解，为什么对于文化革命有这样热烈的讨论。

李盛平：我插一句，确实有一个如何更加全面认识文化革命的问题，还有一种是良心，道德和做人的问题。有些人吃着洋面包，到中国装孙子。你为什么不出来？三十年代有所谓“红色旅游共产主义”，说苏联肃反有理，他就不去苏联接受肃反。

高粱：文化革命是站在现存体制的角度来反体制，是中国历史的奇观。出于什么动机搞成十年动乱？我想听听不同的出发点。我们当时那么狂热地相信毛泽东，老百姓不平则鸣，有发言的要求，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耽误了10年，毛泽东也了不起，能够动员这么强大的力量，如果用对了，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果。结果搞的不好，到今天还没有平息伤痕。在文化革命中搞成了两弹一星，和运十，与波音707差不多。在被包围时以军事带动科技，正是发展最快的时候。大家拿三五十块钱就干出来了，现在人心都散掉了，能够干得出来吗？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产生的这么大的力量，现在不存在了。文化革命过分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了。几十万个群众组织，绝对不比法国革命史差，现在对于法国革命的研究一直没有断，还专门成立了的学科。而对文化革命却不许研究，大家差不多都忘掉了。中国是从一个帝国向现代化的最高的拐点，深重的灾难，不能就这样白白地付出了，要很好地总结和理解。

高粱：80年代发生过一起南韩客机被北朝鲜特务安置炸弹炸毁的事件，那位北朝鲜女特务被南韩政府抓获后，思想转变，痛悔自己的罪行。韩政府曾安排她与一位被逮捕的南韩人、替北朝鲜服务的女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见面。两位各自阵营的叛变者的会面情况，当时“参考消息”上曾有精彩报道。甲对乙说：“你太不了解北朝鲜的社会。”乙对甲说：“你也太不了解南朝鲜的社会”。

此事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读者尽可充分发挥想象空间。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西方的左派所以对中国文革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并持赞扬态度，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重要的原因——比如当代议会民主有许多虚伪性和不公平之处，存在大量社会不平等（种族性别贫富）。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永久的生命力。文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立一个纯洁的新世界，当然对西方世界中的左派大有吸引力，中国一时成了全世界的延安。68年法国学生上街造反，后来培养了一代思想家，与我文革有直接关系。

89后反“自由化”恐怖运动，御用文人反复宣传的，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以此证明，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没有道理，所以妄想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道理，所以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最好的。

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自己的实际问题，需要的理论取向是不同的。不能用西方议会制度的不合理处来证明我们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也不能用西方人出于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动机对文革的评价，来证明我们文革的合理性。

中国政治制度最缺的是民主。35岁时的毛泽东，感慨中国民众“太需要民主了”。（见“井冈山的斗争”）这是“旧民主主义”思潮对一代青年的影响。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和“（一个党代表）多数人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不管其理论根据如何，80多年的共产主义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实际执行起来，最后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专制、低效、特权和腐败。

毛的文革，是列宁式的“直接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大民主”（大民主还没有认真界定过，似至少应该包括“直接”、“广泛”和“不讲程序”）。大民主实际上只存在于1966—1968年很短的一段时期，那是中国的社团史最辉煌的时代。民众最初的发动不乏真诚的动机，但很快变成无谓的派性斗争、暴力和全国动乱。其本身有没有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可以讨论，但我看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很有限。

这场革命的理论根据，当时有一整套说法，今天回头看，经不起推敲。“反修防修（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感情），革走资派的命（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本能反感），触及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等。实际上是动员群众整肃国家机器（造反夺权）。最令人不解的是，国家领袖何以要诉诸群众运动来拆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机器。可能的解释有许多种，如1.毛已经大权旁落，无法用正常程序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2.毛有“革命情结”，讨厌万马齐喑的状态；3.“四清”的继续。不管怎样解释，这实际是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为政治斗争服务。所以这个理论，其逻辑的不合理和道义的虚伪，到今天回头看，都是历史罕见的。至于“斗私”之类，其经济上的不合理，恐怕今天的左派也会承认的。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是有功的。没有这个否定，思想解放就走不出去，更不会有改革开放。

当时广大人民拥护文革，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反对官僚主义（这和1957年整风的初衷相同，说明毛也感到国家机器的涣散化、腐化太快，需要制约力量）。这大概是今天有人对文革有好感的原因。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人民的革命权。但可惜，用大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的官僚主义问题，真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今天对这个问题应该看得清楚一些了。我相信，谁都会承认，利用舆论监督，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如议会制度对渎职官员的弹劾和撤换的权力）来实行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跟“大民主”方法相比，前者应是首选。大民主就是革命，革命完了还“继续革命”，永无休止，把革命“制度化”，（“我们找到了防止修正主义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每过七八年来一次”还写进过宪法）就是在拿历史开玩笑。

这个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只认识一个领袖兼皇帝（个人崇拜）的旗帜下的民众造反夺权、重建政权和秩序。这无疑是一场“假造反”，“可控的造反”。（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都是以毛为大旗，以求达到自己狭隘的团体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人导演的历史运动，尽管这个“可控”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这是又一个历史之最。

文革的发动，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只能归功于毛一人。这个历史大事件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因素。（1967年埃及纳赛尔也想学着搞，结果大学校园一周内就发生武斗，教室尽毁）。一个现世的“活神仙”，开天辟地的革命领袖，思想家、诗人……（四个伟大），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依靠群众搞政治和思想的净化运动等等。它的发动，也许迎合了中国民众内心关于皇帝、官吏的传统认知模型。但这一切又是为了政治斗争服务，而这个“最先进阶级代表”

的革命政治的运作，其出发点和运作方式，和古代宫廷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地方。

这个革命不是改造一种制度的革命，也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倒确实是“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是“整肃内部”的革命。有一段时间大民主发生“失控”，演变成暴民运动，对当时整个社会精英层造成极大伤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无谓的巨大损失，说是“浩劫”一点不过分。在沸腾的时代当然出现了各种社会势力的要求，冒出了各种思潮，它确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学的破坏性试验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史真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

这个革命，不仅理论根据有很大的虚伪性，其进程和结果也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就是所谓“运动群众”。文革时代的上层政治斗争创中共党内斗争丑恶之最。以革命的名义利用天真青年残酷迫害反对派人士，这是道德沦丧。毛还以“斯大林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我们不这么干”而沾沾自喜。表面上标榜“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但实际上在毛夫人、中央文革眼中，群众运动是为实现个人野心，窃据高位、排斥异己服务的工具，用过了就象抹布一样扔掉。昨天是“向革命小将致敬、小太阳、不许压制群众”，明天又是“昙花一现、该小将犯错误了、要接受再教育”。谁胆敢反对他们，那就翻脸不认人，一巴掌打下去，变成专政对象，现行反革命待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在文革时期发挥到了极致，终于得到了最完满的诠释。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九大“权力再分配”后，“大民主”的历史任务完成，对各种反对派（九种人）实行“全面专政”、“群众专政”，用尽迫害手段，全国陷入无可救药的死气沉沉的状态。思想可以犯罪，思想犯可以处死。这就是“…最广泛的民主”，也就是何柄棣 74 年所描写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文革的负作用，有目共睹。其经济上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政治上对我国政治体制和官僚机器所造成的后果，比较复杂，需仔细分析。意识形态上，只能用“坏事变好事”来概括。（是真正的政治学普及班，是引发思想启蒙的开端，但付出了巨大历史代价）。但坏事就是坏事。官方“全盘否定文革”，是得民心的。用“符合官方说法”来作为争辩和反驳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欧美民主制度的丑恶，与文革时代政治的丑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正是在身处其中的这个丑恶中形成了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中国的文革，是地道的祸国殃民，其彻底失败是必然的。

所以，文革能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谬误，和中国千年专制传统，以及这两者在毛时代的奇特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机器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不深刻反思文革，就迈不开政治现代化的步子。官方尽管对文革持“全盘否定”态度，但终究这是本党历史的莫大污点，在宣传方针上，压制对文革的反省。巴金多次倡议建“文革博物馆”，被置之不理。这正如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但巴金说过，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王东成：有的学生说，老师你丑化文化革命，我的父母也是老三届，他们说文化革命没有象你们说得那么坏。文化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人们狂热要求参加，后来全盘否定，将来中国肯定会再搞文化革命，杀这些贪官污吏。我说，文化革命中没有多少贪官污吏。我不能理解崔之元这些人为什么会从文化革命中发掘出鞍钢宪法？他们在外国话语权很充分。在国内象印红标这样的研究不能发表。

卢周来：我想就“文革”提出以下七个问题请教于在座各位大方之家：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 Barbara Tuchman 写过一本《实践中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尤其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个性化的回忆无法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以至于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史料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和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忆“文革”的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利”，提高他们的地位；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关于文

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这些家伙也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们看得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在文革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么低下



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70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王小东：赵紫阳也想用专制推进市场经济。听说严家其在海外说，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看来对了。有些认识，虽然非常不对，但这是现实。高粱：其实1993，1994年毛泽东热，和法轮功，说明一些问题。）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着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着集体资产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我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着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梁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

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王东成：为什么对刘少奇那么样？

李盛平：很多事对你是问题，对我们不是问题。比如整人，说什么“上楼，下楼”，“脱裤子洗澡”，一堆词。李达给毛泽东写信，说求你饶我一命。

卢周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当王者师，一方面看不起老百姓。

李盛平：20年改革以来才有精英，文化革命时期是臭老九。

杨帆：说问题不要摆资格，我最反对摆资格。不一定你经过文化革命你就有资格。没有经过的就没有资格。如果这样，你凭什么谈中国历史？

第二，确实应该很好认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说文化革命的好话？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在座的我们这些参加过文化革命全过程的人，不主动反思这个问题，那么就只有让人家去评价了。我是不想让出这个舞台，才请大家来谈。听一听青年人怎么说我们？我们要自己好好认识。不能听不得人家说文化革命好话。怀疑人家动机和立场。

第三，现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和卢周来搞经济，恐怕比你们各位看得清楚。现在存在改革开放重蹈文化革命复辙的问题。不服气以后我们以后专门谈，5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危机？这个危机就是20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当然有权力不受制约的背景，你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不彻底。我写的权力资本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拒绝改革，使得大家失去了信心。这样改革开放能够改得下去吗？

就出来了经济学的极右派，专门打击反对腐败的人。有些以前的改革派如曹思源，到处鼓吹私有化，工人那边都暴动了，你说话就应该换一个角度，我以前也说私有化，现在我不敢了，而是从补偿角度说，这里的确有一个立场问题。那边工人下岗，暴动，知识分子再说私有化，说什么为了什么理想社会牺牲一代人，工人对你什么看法？所以这次整顿到经济学极右派头上，我一点也不奇怪。

中国改革自1995年以后已经不存在”帕累托最优“，出现了绝对受损失的利益团体。所以经济学出现危机。希望你们听听经济学极右派说了什么？你们缺乏敏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压迫你们。我们受压迫对象不太一样。

李盛平：我们不在一个坑里。

杨帆：但是有一个问题：谁的感受更接近于中国实际？中国的人民？王力雄看出来了，他说现在搞得太右，将来会重新出现极左。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不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现在的形势有点象文化革命后期，只有一小部分人得到好处。所以许多人要怀念毛泽东。而且现在是与文化革命有关系，文化革命搞过分了，现在有反弹，也是由于民主推进不够。

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最反对专制的，为什么要肯定中国 9 0 年代的发展？

王东成：我们没有肯定 9 0 年代的权力资本。

杨帆：那 9 0 年代的发展，少数人暴富， 3 0 0 0 万工人下了岗，他们怀念文化革命，你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我很理解，但是我不是没有钱。文化革命中工人没有这么惨。

王东成：那也有良知问题。我在江西和一个老工人谈，他说：毛泽东没有把我们工人农民打成反革命。他整知识分子，谁让你们说那话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打成反革命吗？你不能夸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

杨帆：我是说大家要理解目前的情况。文化革命的路走不通，现在的西方路也不一定走得通。可以参考张祥平的意见，儒家文化。许多主流派，那些主流派知识分子，他们在 9 0 年代的出名，不是竞争出来的，而是政府在”六四“以后的明文政策，特殊提拔的。他们一反民主，二反民族，三反民生，特别是拿老百姓不当人，精英意识太强。怎么不引起老百姓对文化革命的反感？

王小东：八十年代也不是全好。比如”河殤“就体现出知识分子对普通百姓的那种蔑视。你说农民没有良知，那么把那些呆板一点的农民说成是没有资格在地球上活，知识分子有没有良知？你们不批判，你们有没有良知？

卢周来：包括把知识分子的死亡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描述得不一样。

张祥平： 1 9 8 5 年以前是好的。

杨帆：包括我在八十年代也是非常批判传统文化的，那时不敢批判现行体制，就批判传统文化；另外也不完全是害怕，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改革时都批判传统文化，那是一个保守体系。当时就是那个认识，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了。你不能脱离当时历史背景。

王小东：我当时是理解的。但是河殇作者不承认。

杨帆：但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大家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可以推进中国改革。根本问题是八十年代以后，拒绝了民主，使知识分子失望。政府采取了对知识分子的分化政策，培养一小部分人暴富。老百姓就是反腐败，管什么民主还是不民主。权力资本认识到不能够只是高干子弟暴富，还需在各个行业培养暴富阶层，作为社会基础。包括在教育部和社会科学院，培养“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标准就是外语好，可以和国际接轨。就是不谈和中国实际接轨，实际是把有草根意识的老三届排除在外。

李盛平：有这样文件吗？

杨帆：当然有。这是组织系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中让经济学单兵独进，把经济学捧为神学；在经济学家中排斥草根意识，片面鼓吹与国际接轨，破格提拔少数人，捧为神甫。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利益关系的，是把人性抽象为“经济人”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学问凌驾于其他学问之上，成为社会信仰，还得了！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社会危机与经济学至上的关系无论经济学是误导还是辩护，都不光彩。奇怪的是，你们非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此没有感觉？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和经济学极右派一样？

自由主义在90年代被专制利用了，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应该出来批判。你不批判不行，不能够简单地说“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是不是自由主义，不是你宣布他不就是，宣布他不是就不是的。这是有学术标准的。他们口口声声奉哈耶克为祖师爷，甚至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先议论一番“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好象文化革命中必须先朗诵毛主席语录一样，怎么不是自由主义？如果他们利用你自由主义的名义，说出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的错误观点，而且流毒极广，一个可能就是，自由主义本身如此；另一个可能是他们歪曲和利用了自由主义，败坏了自由主义名声，你作为自由主义者，不出来批判和澄清，难道不应该“忏悔”？我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表层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内心是家族主义者。我不了解自由主义，也不能批判它，但是我非常了解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危害，我提醒你们。如果是虔诚的自由主义者，划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界限，分清两者的联系和界限，不要让他们败坏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名声。秦晖已经认识到了，他说，王小东利用张曙光批评何清涟的问题，直接批判自由主义，如果再不和经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自由主义就危险了。张曙光在1999年代表相当一部分经济理论界的人出来宣布何清涟的书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支持何清涟，已经造成了自由主义的分裂。自由主义者不要借口不懂经济，回避这个问题。

李盛平：任何主义都可能被政府利用。

杨帆：我非常尖锐地向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命题：90年代政府主要利用了自由主义。因为是在和平环境下，只能如此，这是逻辑问题。实际利用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经济自由主义”。如果外部紧张，将主要利用民族主义。

王东成：我对卢周来的发言说几句。秦晖说，不在于主张什么，而在于当下反对什么。当下就是要反对权力垄断，至于援引什么资源都可以。甚至于重新解释文化革命也可以。

卢周来：所以我肯定崔之元的观点。

王东成：你要研究历史，距离感是保持客观公正的必要条件。要超越个体生存和集团生存，才会有客观公正。不能说没有经过文化革命的人没有发言权，但是你必须先了解才有发言权。而

且这种了解不是从文件上看的。鲁迅就是从历史上满篇仁义道德中发现”吃人“两个字。

工宣队长打我的时候，首先就宣布”不要打人“，然后他出去了，等到打得差不多的时候，进来了，说谁让你们打人的？实际是他授意的。

张祥平：你说的全是真的，但是如果有许多青年人以文化革命来否定现状，那么将来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卢周来：但是你没有证据说是毛泽东授意打人的，毛泽东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是下边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杨帆：你这个看法不对。文化革命打死这么多人，当然应该由其发动者，包括其主张的理论体系负主要责任，应该预见到自己发动的动的结果，如果控制不了就不要发动。发动者对于具体的个人和行为可以不负责任，但是对于自己造就的宏观环境和条件，必须负责任。比如说近20年的大吃大喝，腐败，三陪，领导人不知道下了多少文件制止，打击不可谓不狠，但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造就了一个环境，使许多人自发地去做这些事情，你能够说主要责任不是你的我没有让你去打人或者搞腐败啊。

卢周来：我不是拥护文化革命，而是提醒警惕，不要重新回到文化革命。

王东成：崔之元有意在描绘另外一个文化革命。他要引导我们回到毛泽东那里去。鞍钢宪法那里有民主的因素？我在工厂里干过，完全是控制，没有民主。

李盛平：我是以批判文化革命来表达我的理念，卢周来是以理想的文化革命表达理念，如果是针对90年代的问题，我非常理解。至于说会不会有再一次文化革命，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是消极的理解，你是积极的理解。另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现在是被利用了。

王小东：但是自由主义被利用得更多。

李盛平：民族主义是不是话语权更大？

王小东：这个前提错了。自由主义的书出了多少？他们出了许多书，我们民族主义者只出了一本书，也被封杀了。

李盛平：没有封杀。听说只是因为书皮的问题。听说销售了3—4万了。

王小东：不是。是因为内容。有文件可以证明，说我们的书”此书不得在图书市场是销售“。他不封杀我们销售得更多。我们有市场潜力。你们几位不具有多大话语权，但是有一些人话语权很大。刘军宁有一篇文章：说当自由与民主冲突的时候，自由优先，要牺牲民主，最符合当权者的想法。还有盛洪，他们以文化革命来否定民主，说多数人投票会妨碍个人自由。他们总是用文化革命来否定民主。

李盛平：那是我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有几个帮闲的人，说帮忙的话。我也很愤怒。杨帆对于经济学感受很深，我没有体会，就没有认识这有步。但是我对有些人也是很愤怒的。

王东成：这在学理上可能有，但是在中国现实中从来没有过。哪个时候是民主压迫了自由？他们说就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文化革命才不是民主。

王小东：我和他们当面辩论过，中国没有这种问题，你们是什么意思？王东成你们也没有批判他们。问题不在于文化革命是不是民主这个现实，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在座各位不能够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反省，那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如文化革命可能回来，我不希望回来。

王东成：秦晖在自由和公正中处理得好，他最早提出：如果自由主义者不扛起社会公正大旗，就会被别人扛去了。道义和形象都会大受损失。

王小东：在西方经济学中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只能谈效率，不能够谈公平。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学校经贸大学，就是不让谈公平。我刚从日本回来，课堂上不许谈分配和公平问题，我非常生气，在日本可以提，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提了？

王东成：我早就主张提社会公平。只有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才这样说。他们说经济学极右派为什么挨整？因为他们说“抢劫有理”。但是那些发财的人不愿意你论证这个，他们希望你说他是勤劳致富。

王小东：有一个经典的解释：有人靠抢劫发财，经济学有些人在他门口论证抢劫有理。但是那些人或者是政府，有时候想让他论证这个，有时候不想让他论证。他说我是蹬板车发的财。

王东成：我和樊纲当面争论过，那里有不讲公正的效率，有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我们是搞人文科学的，公平我们心目中地位非常高。但是你不能够说文化革命时候公正。

卢周来：这不是学理的问题，老百姓就是认为文化革命公正。工人下岗了。

印红标：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自由主义。等着社会民主主义，到现在没有出来。

王小东：经济自由主义有话语权，当他们以自由主义名义说的时候，大家就是以他们说的去理解自由主义的。

张祥平：全球化和文化革命全是乌托邦。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